

讀史論人生

張建雄 著

商務印書館

讀史論人生

作 者：張建雄

責任編輯：徐昕宇

封面設計：涂 慧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 刷：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017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6589 6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目 錄

序	ii
1 錢穆論人生和歷史	1
2 人生路向和素養	37
3 歷代青年和教育	79
4 近代人物的見解	107
5 歷史的殘酷和公正	129
6 歷代君王的功過和命運	149
7 美國的另類思維	173
結語	189

序

這本書的靈感，來自一封 2009 年給兩個兒子的信。這封信其實是應招商銀行的《財商雜誌》所寫的。這時候兩個兒子早已成年，並已成家，只欠還未當上父親，我的角色亦從“為父”、“為師”轉到“為友”的階段。我亦脫離了金融界足足七年，在上海置了一個家。每年只在城市大學開講時，才回香港短住。生活亦由“絢爛”轉為“我行我素”，只見想見的人，只說想說的事，是退休人士的專利。周遊列國，看盡人世滄桑。互聯網的急劇發展，2008 年的華爾街金融大災難，令人感慨萬千。能給兒子的意見（不敢說忠告），是“聚福緣”——“受得富貴，耐得貧賤”，“受得成功，耐得失敗”。如何發展，確也是看他們的福與緣。

不知不覺間，已退休 14 年，在上海體驗了中國的“野蠻生長”多年，看着樓價上升和人民幣升值，亦成為“既得利益”的一群。也不必玩甚麼投資，選擇對了地點就夠了。真的有“發達秘方”，誰會公諸於眾？這是常識。所以人生無外乎“命與運”的陰陽互動，歷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十四年來，讀當代“四大歷史名家”呂思勉、陳寅恪、錢穆、陳垣的書，沒有白讀。將所得公諸同好，亦是理所當然。《信報》“毋枉管”專欄的讀者應有所得。但集之為書，有系統地讀，也不是人人都做得到。歷史是殘酷而公正的，歷代君主大多數是“有命無運”，有貢獻的極少，為害的卻不少，本書舉了不少例子。

過去 150 年，是中國的亂世，只有最近三十年為小安。我們的前輩又怎麼看？最精彩的是牟宗三《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的文章，筆者不厭其煩，替老師續了六十年，直到 2016 年。看來青年期仍是一個“能

破不能立”的局面，這是一個教育的大問題。教育本應是教育社會而不是社會反過來教育如何教育。西方的“寬鬆教育”、“快樂教育”與“虎媽教育”孰優孰劣，值得討論。本書包括一些美國人的另類意見，看看能不能東西方互補，亦是本書的目的之一。

筆者在本書編輯後，再給兩個兒子一封信，闡釋“天命”和“運程”的道理，與坊間的迷信無關，人生就是確定自己是甚麼“命”，準備好自己，得“運程”一到，乘機而起。又知道及時下車，能過一些平淡而從容的生活，等待下一個“運”，不必急躁。當然，知道“天命”，而能“天人合一”，那就是最幸福。這個過程不假外求，不是算命就得。

是為序。

張建雄

1 錢穆論人生和歷史

“士之使命”的現代化

1955年錢穆在日本東京大學演講，主要是講中國社會的傳統觀念和“士”的使命，其內容在《國史大綱》中都有提及，本文意在將其融會貫通，只怕力有未逮。首先，中國傳統觀念，是希望“以學術來領導政治，再由政治來支配經濟”，從創造一個合理的，以達到完美的人生為目的的社會。這基本上就是幾千年來的“中國夢”，但弊端是“安而不強，足而不富”，近世遇上“強而不安，富而不足”的西方社會，乃有“巨獅不醒”的痛苦。而中國社會自秦統一全國之後，就是“士人政府”在管理，所以“士”沒有當好自己的使命是主因。若說“士”之上還有一個皇帝，2015年正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袁世凱稱帝百年之年，將錢穆60年前寫的文章和《國史大綱》並讀，並未過時。

四民之首——士，所謂“士”，是“士農工商”，是四民之首，錢穆說是“中國社會所獨有”，西方人不易明白，其定義有七個“非”：“非貴族，非軍人，非官僚，非富豪，非宗教信徒，非專門學者，亦非一般庶民”。只是“讀書識字”，不是“士”，要“讀書明理”才合格。所謂“士”，是“一群立志達道的人”，最具代表性者是北宋的范仲淹，他創“秀才教”，“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乃士之性格。其他特性亦可見諸通行於世的名句，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士可殺，不可辱”；“士為知己者死”；“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最怕“士無鬥志”，這是清末為甚了。

《論語》“子路”篇亦兩次討論了“士”，第一次是子貢問“士”，孔子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等而下之是“宗族稱孝，鄉

黨稱弟”，“言必信，行必果”；“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是朱熹的註解，所以士的要求也很高的。這段對話最後一問，是問孔子對魯國執政者“三桓”的意見，“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說：“噫！斗筭之人，何是算也！”在孔子眼裏，“士”的要求蠻高的。另一條是子路問“士”，孔子說：“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這是故意補子路性格之不足，切切誠懇，偲偲詳勉，怡怡和顏，都是子路平日做不到的事，孔門弟子去當“士”，也有不足之處也！朱熹註解：“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

研究中國歷史可以從研究士入手，士如何產生和士有何地位？士如何滲入政權，掌握政權？都可以從《國史大綱》中找出來。錢穆將中國歷史分為五期，其實加上現代社會，可以是六期，它們分別是，（一）封建社會；（二）遊士社會；（三）郎吏社會；（四）門第社會；（五）科舉社會；（六）現代社會。這六個階段，士的使命如何，在國家在社會的真責任和真地位如何，正直接影響國家的盛衰，比古代皇帝更甚！

下文是每一個階段，加以說明：

一是封建社會，由西周至春秋（公元前 11 世紀至公元前 476 年）。中國封建乃西周王室完成其統一大業之後所產生的政治制度，係由上而下，和西方的由下而上，是兩回事；而中國封建的崩潰，乃因平民社會中產生大批自由學者而發生的。春秋時代共 242 年，是古代貴族文化發展到最高點的時代，錢穆稱之為“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致的時代”，但貴族階級的崩潰，平民階級的崛興，是貴族文化醞釀的應有後果。中國學術之黃金時代，是沿襲春秋貴族的舊生計，“精神命脈，一氣相通”。我們熟悉的先秦諸子，是這時代的代表，孔子、墨子的政治生命欠佳，但他們的弟子都是當時的士，子貢、子路、子夏莫不可有其地位。諸子百家爭鳴，但貴族仍為主導，“晉有叔向、齊有晏嬰、鄭有子產、宋有向戌”，都是當時之士。

二是遊士社會，即戰國時代（公元前 475 年至前 221 年，共 246 年）。戰國新興平民學，不是推翻貴族學，只是“異樣翻新、遷地為良”，此乃“中國文化一脈相承之淵博大處”。這期間出現的孟子一樣不得意，成功登位是商鞅變法，後有蘇秦、公孫衍、張儀，還有魏文侯用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齊國更有稷下制度，大量養士。戰國中期，貴族與遊士在社會上地位倒轉，根據《國史大綱》，此期的遊士可分五派：（一）勞作派的許行、陳仲；（二）不仕派的田駢、淳于髡；（三）祿仕派的公孫衍、張儀；（四）義仕派的孟軻，儒家正宗；（五）退隱派的莊周。這五派的平民學者的聲氣和地位，超於春秋的孔子、墨子之上。到戰國末年，學者思想反遊士、反文學，出現了老子、荀子和韓非子三派理論，而荀子理論，直接影響了兩漢，主張“以聖王為師，以王制為是非之封界，主定學術於一尊。”平民取代貴族，為漢代平民當皇帝，開了先路。

三是郎吏社會，兩漢（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20 年，共 426 年）。兩漢以學校為中心，“學術”和“吏治”成為社會秩序的核心，漢文帝時出現賈誼，“陳政事疏”、“揚文教，移風俗”。漢武帝時重用了董仲舒，有“天人三策”，黜百家，立五經博士。此輩對政治發生重大影響，乃起“學術”指導“政治”的先聲，從此士人參政，“公卿朝士，名儒輩出”。

漢代歷朝，為相者皆一時大儒，不過今人已不復知王吉、貢禹等大名而已。兩漢定制，凡進入國立大學中的優秀青年可以分派到中央政府為“郎”，成績較次者，則派遣到其所從來的地方為“吏”。郎是中央皇室的侍衛集團，吏則是隸屬於各行政首長下的公務人員，在吏之中，成績卓越者，仍可提拔至中央為郎。兩漢不同處，是西漢社會是流動的，而到東漢末，出現了世家大族。但東漢初年，光武帝本身是太學生，他的同學鄧禹和手下寇恂、馮異、馬援、賈復、耿弇等人，大半都是通儒，朝廷對儒學的極度提倡，較之西漢遠過。

博士弟子漢武帝時僅 50 人，到王莽時，博士弟子 18000 人，士階層的大盛可見。太學生群聚京師，乃有清議。此輩太學生與朝廷大臣聲氣相通，“其言論意氣”，往往足以影響實際政治的推移。清議之外，又有門第，累世公卿出現，楊彪一族，四世三公，袁紹一族，四世五公，東漢士族重私人 and 家庭道德，但救不了王室傾覆。

四是門第社會，魏晉南北朝（公元 220 年至 589 年，共 369 年）。漢末群雄基本上是當時著名士族中人，袁紹、公孫瓚、劉表、劉焉、袁術，甚至諸葛亮亦是名士，但沒有人要一個統一的國家，大家離心離德，中國只有沒落。曹魏、司馬晉政權，腐化黑暗、不光明、不穩定，出現了竹林七賢等名士，無助政權穩定，乃有胡人南下，文化中心長安洛陽俱毀，復興要等 200 年後的元魏孝文帝這位鮮卑皇帝重建洛陽。

此前北方大族，紛紛南渡，王敦、王導助司馬家建立政權，乃有“王與馬，共天下。”南方門第，以王、謝、朱、張四家為盛，北方則因元魏統一後進行漢化，北方門第乃可發功，范陽盧氏、博陵崔氏、趙郡李氏、河間邢氏、渤海高氏、太原張氏都是世族。元魏雖亡，北方文治勢力進展無可擋，西魏出現蘇綽和盧辯兩大儒，以周禮定官制，“六條詔書”成為官吏新經典，北周繼續漢化，漢人士族更得勢，“從學術影響到政治，回頭再走上一條合理的路，努力造出一個合理的政府來”，乃有隋唐大治。

五是科舉社會，此處又分前期，唐至宋（618 年至 1279 年，共 661 年）；後期，明至清（1368 年至 1911 年，共 543 年）。科舉前期，唐太宗追隨了隋煬帝的科舉制度，保障所有公民有自由參加科舉的權利，取代了世家門第特權，但禁止商人應考並限制官吏經商。所以，唐代雖然工商資本活躍，甚至對海外通商，但仍是一個以“士”中心的傳統社會，貞觀之治的政績之一便是實施教育，推崇國學，增創學舍 1200 間，設博士，甚至有國外留學生，“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其盛為近古未有。”但不幸這一制度到武則天時代終止了，教

育既停，只有考試，猶重進士科之詩賦，所以唐代多詩人為官。由“唐初四傑”的王勃等人，到盛唐的宋之問、李嶠等皆是，但詩賦日工，吏治日壞，南方人文采風流，代替了北方人的樸厚。唐代盛運發生危機，有資人多而官位少，宰相一職仍以世襲人為多。到安史亂後，藩鎮興起，失去了政治和社會的內部均衡，外族入侵，乃有五代十國的最不堪局面出現，只有民初的軍閥可比。

到北宋為了反唐人餘弊，嚴防華夷，重文輕武，裁抑王室貴族之奢淫，主張讓“愛教育、講道理的讀書人為社會中堅”，范仲淹如文初言，創立“秀才教”，以“天下為己任”，但要“成千上萬讀書識字而不明理”的官僚和秀才們，放棄特權，談何容易，所以范仲淹革新失敗。三十年後，王安石亦失敗，但又反映出歷史進程中的“南北之爭”、王安石為南方知識分子，“開新而激進”，司馬光乃北方知識分子，“傳統而穩健”，而新舊黨事，亦反映中國南北經濟文化的轉動而已。

宋史與南方人的不幸，是出了蔡京、秦檜、賈似道諸人，所以宋史“奸臣傳”中，幾乎全部是南人，而北方人則出了元祐諸君子：洛、蜀、朔三派，洛派程顥、朱光庭；蜀派蘇東坡、呂陶；朔派劉摯、劉安世。新舊南北之爭，為投機的官僚政客創造了機會，司馬光看錯蔡京，以為是良才，貧弱的北宋乃在政潮中覆滅。南宋一開始就是岳飛被殺，秦檜用事，單是手下執政亦換了28人，沒有一個善類，人才既息，士氣亦衰，後期總算出了朱熹、陸象山、呂東萊一批士人，不算交白卷，朱熹更是被朱元璋大捧場，影響了明清科舉。

科舉後期，元代科舉有名無實，科場舞弊是常態，有真才實學的漢人、南人多不屑應舉，沒有人才的政府兵力再強也無用，所以蒙古百年而亡。朱元璋是劉邦以外唯一一個平民皇帝，但朱元璋心目中，最可怕的唯有讀書人。除了盡誅功臣宿將，廢宰相之外，更用嚴刑酷罰來對待士大夫。京官每入朝，必與妻子訣別，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所以當時文人多不仕，到朱棣當皇帝，誅方孝孺十族，處死847人，鞭笞之刑乃尋常事。所以當時之

“士”，“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但傳統政治已發展成“士人政治”，朱元璋亦無法改變，只能“使其為吾用，不是為吾患”。宋朝的“尊師相，抑君權”為明朝的大忌，朱元璋創出八股取士，同時極重學校，考試按月考驗，三年大比，優秀知識分子進政府為官吏，教育散佈全國，“耕讀傳家”的觀念，得以發揮。中國文盲大減，亦由此起。到明代中葉，名儒輩出，到處是書院，名儒有李時勉、陳敬意、羅欽順、蔡清，“成材之士，多出其門”。

明代的翰林院，更成為中央政府中最高貴的學術集團。內閣學士多出自翰林院，所以翰林院乃儲才養望之地，到清朝亦繼續用此制。但明朝又獎勵廷臣風發言事，以“危言激論自標異”，造成“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致於以議論誤國。”明末崇禎迫於言路，不敢言和，固因秦檜的影響，但廷臣亦無敢主和事，明朝最後至於“一無可為而止”！明朝只有開國頭百年，吏治尚清明，和西漢有得比，但昏君懶皇太多，“士”亦難救！

明代特色是各地遍設“書院”，著名的四大：“白鹿洞、嵩陽、嶽麓、應天”是宋代就始創，最後遍地開花。學者以個人品格、學風來扶植後代子弟，開發民智，陶育人才，但最終仍在改進政治，創造理想世界，但如此則造成政府與書院對立，書院屢遭毀禁，尤以東林書院的慘劇最具代表性。

進入清朝，滿清是狹義的部族政權，以鎮壓士人為要務，大興文字獄，繼續以八股取士。士已忘卻了其自身的責任，清高的理想，以“天下為己任”的壯志已滅，民間書院興起，是針對士風墮落。明朝遺老雖志節堅貞，但“遺老不世襲”，後代士子亦有應舉，才能維持生計。所以顧炎武、王船山、孫夏峰一輩，只能留下民族元氣，成為清末革命最有效的工具。所以在清代，“學術領導政治”的傳統已失，政治卻達到支配學術的境界。加上農村經濟枯竭，商人又淪為外國資本的買辦，清朝要改革的人卻只是柔弱的君主光緒，知識分子的康有為、梁啟超，追求“全變、速變”自然失敗，滿清亦亡國。

中國進入新世紀的一百年，據錢穆的觀察，中國知識分子（士）的新思想

是：尊重去國留學，吸收西方科學，但又無攝取科學的經濟後盾，從而自信力日消，是近代的中國悲劇。二十一世紀的“士”的責任，又是甚麼呢？栽培科學的經濟基礎已經有了，融合東西方文化是必需的。

六是現代社會，民國時代至今（1911 年至今）。滿清解體，中國進入軍閥和黨爭時代，錢穆評為“新政治情態之腐敗黑暗而論，唐末、五代殆不過是”。當時的新形態士大夫，抄襲歐美成法，創立國會，制定憲法，成立政黨。“誤認分黨相爭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殆不知所謂和衷共濟與舉國一致”，世人要到百年後的今天，才恍然大悟，“一般黨員，則憑藉黨爭的美名，來公開無忌憚的爭權奪利”。上述是錢穆在八十年前的觀察，居然至今仍然在所謂民主社會中發生，豈不痛哉！

軍閥之後，乃有“五四運動”，有五四青年、北伐青年、抗戰青年等知識分子的出現，但在抗日大亂之下，無用武之地。錢穆提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為領導的指標，但隨着國共戰爭，蔣介石退守台灣，三民主義只能在台灣成為指導。到了二十一世紀，三民主義也非必修科了，在大陸則經過文化大革命之頓挫，儒家文化要到二十一世紀再抬頭，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再發力，范仲淹的秀才教精神能否在“士”的心目中再次重現，乃中國夢能否順利達成的關鍵。這點在《國史大綱》的第 46 章，“除舊與開新”，並未討論。但東西方接觸又經過百年，此外留學者眾，不能再“昧於外情”，中國的“國學”就是軟實力所在，“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對世界新使命的開始”，是二十一世紀士之責任所在，亦是錢穆在《國史大綱》的結語也！

歷史上秀才教與改革派宿命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提出，宋明學者中有所謂“秀才教”，是范仲淹等人首倡的，流行於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中的“宗教”。他們以嚴肅的態度，來遵行他們的“純潔高尚而純摯的信仰”，並形成一種合理的教育，可惜的是，不是人人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上有機會讀書以及有資格做官的人，遠遠超過尊崇“秀才教”的人，因此他們空有理想而無法實現，他們對政治悲觀，甚至持反對態度。而一輩盤踞在政府各部門的官僚，亦常敵視他們，甚至屢興黨獄，明代講學的書院，屢遭焚燬，程顥、朱熹皆列黨禁，王陽明亦幾不免。

“秀才教”的領頭羊是范仲淹，亦是主持“慶曆新政”的宰相，秀才而為宰相，要得宋仁宗提拔。范仲淹提出“十事疏”，五事澄清吏治，三事來富強，二事主執行，可見澄清吏治是第一要務。“明黜陟，抑僥倖”，讓賢者上，不肖者退，宋仁宗是 OK 了，但這十事把讀書人的“特有權利”推翻了，這還了得？“暗潮明浪，層疊打來”，范仲淹做了 11 個月，倉皇辭職，宋仁宗心中明白，亦擋不住舉國洶湧之勢，勉強接受了。北宋第一場改革無疾而終，為時亦短，范仲淹能“先天下之憂而憂”，讀書人不肯“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改革第一個教訓，“秀才教”第一個挫折。但不到三十年，王安石繼之而起，推出熙寧新法，與范仲淹不同，“反對范仲淹的，全是當時的所謂小人；而反對王安石的，則大多是當時的所謂君子”。范仲淹和王安石，都是事業失敗之人，都擁有偉大的理想，但所獲評價不同，范仲淹得高度評價，因能“推獎人才”，王安石則因“為小人所利用”，譏譽參半。而不可否認的是，二人

的品格，都是崇高的。所以，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因無法管理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而失敗的，宋朝的讀書人“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反對范仲淹，自亦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奉迎王安石。”原因是范仲淹要“先清吏治”，當然只能反對；而王安石只來推行新法，“不問人品”，當然可以奉迎。千年之後的世界，亦未必能有改變。

性格執拗的王安石

王安石第一次執政先後 5 年，第二次執政僅 20 個月。下台後，宋神宗依然照王安石所定新法推行，先後 17 年，到宋神宗一死，新法即廢，是行政技術有問題，中國古人不識何謂現代管理是大弱點，連范仲淹的兒子范純仁亦指出：“事大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來，積弊不可頓革。”如要事功急就，必為奸人所乘。老實說，17 年間，王安石只開個頭，做了 7 年，其餘 10 年宋神宗要負責，他用了甚麼人，當時史學家當然又為尊者諱了。

王安石一是“自視過高”，二是“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人事即是吏治，但范仲淹前例在前，一講吏治，便要下台，只能不講，但澄清吏治是“寬養民力，厚培國本”的本錢，沒有本錢，談不上武功，所以到現世，先要加稅，才能講增加軍備，哪一個國家不如此？看看日本。王安石的大毛病是“固執不受人言”，但現世哪一個大政治家是不固執的？“受人言”既是重要的，王安石的哲學思想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錢穆稱之為狂論。王安石的確好罵人不讀書，但唐宋八大家，讀書最多莫過王安石，只是不必如此沙塵而已。王安石與全天下讀書人為敵，不管是不是有志“以天下為己任”，都視為流俗，王安石勸宋神宗不必顧群情，說：“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宋神宗當然認同權在自己之手。范仲淹、王安石的共同理想是實現“裁抑兼併，上下俱足的社會”，亦是一個“開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會”。“為法首擇術，當

法堯舜，何必唐太宗”，錢穆結論：“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負，相繼失敗了，他們做人為學的精神與意氣，則依然為後人所師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國。”這是何等崇高的評價！新法失敗，北宋繼續東漢以來，“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呂思勉所言的政治上的金科玉律），天下讀書人與“秀才教”之人不同處就在此。“成敗不足以論英雄，因為事之成否，多半決之於外來的因素。”（亦呂思勉語）王安石變法失敗，但錢穆說，即使變法由名重一時的張載來推行，當較王安石更為迂闊。即使反對新法的程顥，亦不看好舊派的司馬光，說他“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是“才不負當時的艱難”。換了蘇東坡和二程，大概結果差不多，人說王安石只求行法，不論人品，但司馬光居然大大賞識蔡京，看來亦無知人之明。司馬光是一流史學家，卻無知人和執行力則是無疑的，亦是追求“溫良恭儉讓”者的通病。

誰說中國近代改革無人

宋清之間還有一場張居正的十年變法，亦人亡政息，張居正死後還獲罪，可見改革之難，但張居正亦延續了大明壽命半個世紀。在清末還有一場戊戌“百日維新”，錢穆所說的“最近期的中國”，可能指這一場變法。這一代人最佔有學術地位是康有為、梁啟超和章太炎三人，康有為主君主立憲，章太炎主民主革命，梁啟超則是先從康，後從章。呂思勉在其書中，將三人比諸北宋士大夫，康有為最像王安石，性格極執拗，王安石號為“拗相公”，“其偉大在此，其不能盡善亦在此”（呂思勉語）。戊戌變法若竟茁然有成，成績大概亦和王安石新法相仿的。梁啟超最像蘇東坡，是個冰雪聰明的人，對人情世故見得極通透，但亦是一個只能“坐而言不是起而行之人”，所以梁啟超當官並無成績，反而“講學遺其餘生”和寫作最有成就。章太炎則似范仲淹之子范純仁，是個“講究實際，反對徒驚其名的人”。范純仁深知“新法雖受人

攻擊，其中自有是處，舊法亦非無弊”，所以算個新舊二派中的折衷派，蘇東坡亦如此。但政治總是一派的勢力壓倒另一派勢力，兩派總不能折衷。如今的美國民主、共和兩派，亦不過是重複北宋黨爭的宿路，不是甚麼新聞。民主已開到荼蘼，亦是本世紀的大事，中國人深知矣。錢穆和呂思勉遠在 1943 年就深知了，誰說民國無人？王安石、蘇軾、司馬光都是政治家兼文學家，王、蘇位列“唐宋八大家”，司馬光則以《資治通鑒》得名，王、蘇二人比較，“王之潔、蘇之博”各成一家，但梁啟超的看法，是“荊公，學人之文也”，唐宋其他七家則是“文人之文”，“其理則博大而精辟，其氣之淵懿而樸茂”，是王安石特色，而非七子之所能也。至於民國的三人，呂思勉的評語是：“康有為代表着陽剛之類，章太炎則代表陰柔之類。”文學中陰柔者多，陽剛者少，物以稀為貴，所以呂思勉評康有為第一，章太炎次之，梁啟超只能排第三了。大文學家的的定義是，“以最雅馴的語言，表現出現代的思想”，兩者缺一就不能算偉大，文字雅馴而思想有限，平庸膚淺的思想，求其文字的雅馴，本來是不難的，確是的論，後學者留意了。

亦師亦友亦同德

—記呂思勉和錢穆點滴歷史觀點

呂思勉和錢穆同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家，同是江蘇人，呂氏是常州，錢氏是無錫，呂氏生於中法之戰的 1884 年，錢氏生於中日甲午之戰的翌年 1895 年，亦是簽訂《馬關條約》的一年，兩人只相差 11 歲，錢穆雖師從呂思勉，為歷史學啟蒙，稱兩人亦師亦友，亦無不可。作為師長，呂思勉對錢穆的評價如下：“現在的學者中，我覺得錢賓四先生氣象頗有可觀，唯覺他太重視了政治方面，而於社會方面畸輕，規模微嫌狹隘而已。”此文成於 1946 年，錢穆已 51 歲，呂思勉 62 歲，錢穆的《國史大綱》成於 1939 年，早已卓然成家了。《國史大綱》果然也是論政治者多，論社會者少，但錢穆活到 95 歲，社會問題當然也補過來了。呂思勉和錢穆學習歷史，都是古法，由讀《史記》入手，讀法學自曾國藩：“讀書如略地，但求其速，勿求其精。”讀史秘訣是：“能將當世之事，與歷史上之事互勘，而不為表面的記載所囿。”凡議論“能力求核實”，是不二法門。但呂氏堅持：“治史不只是講考據，而是講政治和社會各問題的。”歷史的可貴，不在其記得很多事實，而在其能根據此種事實，來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對於現代社會的成因既然明白，據以猜測未來，自然可有幾分用處。所以呂氏主張中學以下的歷史，改教社會學，以歷史為註腳，而到大學，才再教以歷史，因為大學生的社會閱歷，總比中學生為多，而治史以社會學為基礎，至少可以少花兩三年功夫，而早得一些門徑，是治史第一要義。所以錢穆成立新亞書院，要大學一年級生，必讀“中國通史”，應是本呂氏之意。錢穆要學生讀史，以便“知人、曉事、論世”，人事是世間第一難事，錢穆最後離開新亞，亦是“人事”問題而已。讀史要有主見，非得了解

社會情形，否則對於一切史事，都不能真實了解，所以呂氏主張：“正史材料，太覺零碎，非已有主見的人，讀之實不易得益，所以不必早讀。”今日之學子和百年前的五四青年，中文程度有天淵之別，尚幸有“四大史學家”出現，以白話文寫古代歷史，才免了讀古文之苦，所以二十一世紀的學子，還是有福的。

呂思勉又是如何論政治呢？首先：“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情”。這是西方觀點，因為“政治本來是社會上有了矛盾然後才有的”，“所以政治家所對付的，全是些貪婪、強橫、狡詐的人，毫無手段是不行的。”政治總是把這一種勢力去壓服那一種勢力，這雖然不必是戰爭，其性質和戰爭無異。“政治雖然是兩個階級的鬥爭，然在一定時間內，總有一個階級是代表國民福利的”，發展到二十一世紀，泰國出現了紅衫軍和黃衫軍，誰代表國民福利，也就難說了；美國早就有共和黨和民主黨之爭，誰也代表不了國民福利，更令人莫明其妙，但政客終歸是政客。錢穆談政治，談到北宋新舊兩黨之爭，雙方面都有好人和賢人，王安石雖有高遠的理想，但新政終歸失敗了，只因“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活的人事”，又是“人事難”也。王安石和司馬光之爭，亦是地域上的南北之爭，王安石代表南方知識分子的“開放與激進”，而司馬光代表北方知識分子的傳統和穩健，但兩派最後是互斥對方為奸邪，一味注重道德的高低，而忘了重道德的本意。凡事官場“重小節，忽大略”，“但求無過不求有功”，古代用人，“視成不視始，責大不責細”，北宋諸公做不到，“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千年之後，今人亦感歎歷史之重演，錢穆結語：“新舊相爭的結果，終於為投機的官僚造機會”，如蔡京用事，北宋之亡有六賊，全是投機之輩，“貧弱的宋代，卒於在政潮，屢次震撼中覆滅。”錢穆感歎：“新派亦非無賢者，而終不勝意氣私利之洶湧”，“兩黨皆可責，亦皆可恕也”。今日的黨爭，不能不引以為鑒。讀歷史有實用之處，呂思勉主張：“政治家的功罪，只能問其根本上的主義如何，並不能掂拾着這

一件事，或那一件事，用簡單淺短的眼光去評論。”凡做一番大事的人，總是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根本上沒法子使每個人都說好，所以做大事的人，總是把“毀譽置之度外”的。這些話是呂思勉在為曹操辯誣的文章中說的，在論曹氏家族，呂、錢兩位倒不是同一陣線的，錢穆認為：“曹家政權的前半期，挾天子以令諸侯，借漢相名位剷除異己，下半期的篡竊，卻沒有一個坦白響亮的理由”，錢穆在他的文集中，最推崇諸葛亮，但呂思勉則對曹操和諸葛亮同樣推崇，一個是魏武帝，一個是諸葛武侯，都有一個武字，封建時代的光明面，是有“公忠體國的文臣”和“捨死忘生的武士”，這兩種美德，兩人都全備了，文武全才，是漢末亡國的光榮，魏武帝和諸葛武侯都是不怕“謗毀”的，做大事業，亦又能如此。至於對王莽的看法，呂、錢二人是一致的，王莽篡漢是唐詩所引起的誤會，錢穆只稱這事件是王莽受禪，是漢儒政治理論的自然趨勢，漢末劉家已無人，“王朝德衰，天降異災”，應早物色賢人讓國，“否則革命起，終無以保其位”。

王莽書生本色，治禮，務恭儉，迂執信古而負大志，正恰時代潮流。王莽要解決的是“社會兼併”和“消弭貧富不均”兩大問題，這是一個兩千年不變的難題，二十一世紀有改變嗎？王莽失敗，一是失之太驟，二是奉行不得其人，三是不通情實，變法結果是“人人失業，食貨俱廢”。呂思勉說：歷史不以失敗論英雄。“因為事之成否，多半決於外來的因素”，歷史往往是“事之成於其手”的，新莽失敗，不是王莽個人的失敗，而是先秦以來談社會主義和政策的人共同的失敗。因為王莽的所作所為，都是他們發明的理論和政策，王莽只是付諸實行。此後兩千年，讀歷史的人都知道，社會改革不易，王莽失敗後，“變法禪讓”的政治理論，從此消失，改變為“帝王萬世一統”的思想，影響甚至全亞洲。呂思勉的名言：“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錢穆則稱之為：“中國史演進過程中的一個大失敗”。否則今日歷史改寫。錢穆在評北魏的鮮卑人漢化計劃時稱：“為自己一種高遠的政治理

想”，而引起家庭父子慘劇者，前有王莽，後有魏孝文帝。王莽賜死其子王宇，和魏孝文帝賜死太子拓跋恂，都是兒子反對父親的變法和遷都引起的悲劇。王莽是因改革不當而天下大亂，魏孝文帝則在遷都5年後，33歲即卒。天不假年，否則北魏不致因不能繼續改進，並急速腐化而亡。“歷史上有一番改進，往往有一度反動，不能因反動而歸咎改進之本身，然亦須在改進中能善處反動方妙。”這是錢穆對改革的一番金石良言，北魏雖亡，但北方文治勢力無可阻擋，魏孝文帝看見這潮流，要鮮卑政權與之融合，反對派不明其意，大都做了時代潮流的犧牲品，哀哉！二十一世紀的潮流，誰能看清楚呢！

錢穆論人生和啟發

錢穆敬告中國青年

新亞精神是甚麼？“千斤擔子兩肩挑”，挑的是甚麼？一言以貫之，是“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自信力的復活”。錢穆對弟子們苦口婆心，開始亦只為海外學子對祖國歷史文化有起碼的了解，所以新亞校歌是淺近的，但寓意深遠。錢穆的要求，原話據葉龍所載：“新亞的校風是好的，可是學風還嫌不夠，大家不要單單聽講，也得在課外自修多閱讀。”

錢穆在“敬告中國青年書”中說：“中國是有着四五千年的長期優良文化傳統光榮歷史積累的國家，但同時又是在近百年來外面受盡屈辱和壓迫，內部不斷動亂和災禍的國家；但這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依然在世界上有其舉足輕重的地位。”時空過了五六十年，中國真的已舉足輕重了，外國人已不斷提出“中國威脅論”，就是其一，中國經濟規模已是世界第二（不必追求虛的第一）。但在當時，錢穆已感歎：“今日我們可愛的中國青年們……對自己祖國的以往歷史傳統和文化精神是已模糊了，由於模糊而輕忽而誤解了。”

錢穆說：“無論如何，你們總該對祖國以往歷史文化求有所了知，真的有所了知呀！”所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新亞學生都必修“大一中文”、“大二中文”和“中國歷史”，錢穆的“國史大綱”固然要讀，中國文化則儒道並重，“論”、“孟”、“莊”、“老”已有代表性，其他各家均從儒道衍生而出，至於佛家禪宗、達摩東渡，再一葦渡江產生禪宗，那已是佛學中國化。老外常說中國人無宗教，無信仰，真是廢話。

新亞精神回顧

2015年1月末，新亞校友聚餐，一位五十年代，五位六十年代，一位九十年代，年齡相差四十歲，居然也可以溝通新亞精神，還討論了老關1月26日所寫的新亞精神文章。老關囑咐作個感想，雖然人在旅途中，錢穆著作都不在身旁，恰好葉龍先生寄來一本簡體字版的《錢穆講學札記》，正好可以引述一遍。

首先談錢穆是“史學家”還是“新儒家”？閔教授一言判定是史學家。事實上，在《講學札記》的附錄所載，海外人士多年來對錢穆的稱呼最少有二十四種，其中並無“新儒家”，而“史學大師”最恰當。

錢穆建立新亞書院，提出新四書：《論語》、《孟子》、《莊子》、《老子》，有異於朱熹的四書，兼重儒道，而細讀《國史大綱》，其中關於佛家學說之深刻，更不能以儒家視之，新儒家更不必論了。至於新亞精神，是不是由新亞校歌就可以概括，則另有商議。在《講學札記》附錄中，錢穆說明創辦新亞書院如下：“我們的理想，認為中華民族當前的處境，無論如何黑暗與艱苦，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必會有復興之前途，而中國民族的復興，必然將由於中國民族意識之復興和對於中國民族以往歷史文化傳統之自信心的復活之一基礎上”，“所以新亞精神乃不畏艱險為中國文化繼往開來之精神。”

新亞在憂苦中誕生，憂苦中長成，而且還繼續在憂苦中前進着，所以新亞校歌才會說：“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校歌寫於六十六年前，六六大順，今日新亞學子手已不空，路仍很遠！

腦空空、無一物

錢穆寫新亞校歌為校友所傳頌最多的是“手空空、無一物”，但錢穆最怕是學生“腦空空、無一物”。中國“歷史文化傳統”蕩然無存，中國夢無從發起。

1949年創校，還未稱新亞書院，而是亞洲文商學院，地點在九龍偉晴街，

師生全在一起，“食宿均無定時，有時就買些麵包回來吃”。在那狹窄的宿舍裏，錢穆“常常在那裏踱來踱去，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創校時精神壓力太大，日間又忙於奔跑，學生連夜為其睡時囁語所驚醒，一言總結之：“生活是簡陋的，擔子是沉重的，前路是遙遠的”，所以才有新亞校歌的句子：“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那是生活的照寫。

即使到了學校較穩定，錢穆亦先住九龍鑽石山西南台，其後搬去沙田萬佛寺和風台，即使搬到台北外雙溪素書樓，亦是十分簡樸，和同在外雙溪的張大千摩耶精舍，是不能比的。到筆者上世紀入讀新亞的六十年代，錢穆已離校，新亞學生的生活仍然艱苦，一袋麵包吃三天，仍大有人在。“艱苦我奮進”，是必然的，“困乏”能否“多情”，則要看個人的修煉了。五六十年代的新亞教授也是住在被錢穆稱為貧民區的鑽石山西南台，可想而知，學生都是寒門，是不用說的了。新亞精神已經六十六載了，“與時俱進”是《易經》精神，需不需要新元素呢？

在今天這個“後物質主義”時代，不追求物質而追求精神，不是恰好嗎？要重建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自信心，是其時了，錢穆早就指出讀歷史令人“知人、曉事、論世”，而中國和歐洲的500年浮沉就是可論的世事！

歷史中文皆必修

中大副校長希望“歷史”成為初中必修科，那麼是不是中大的大學生也應以“歷史”為必修科呢？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新亞書院的學生是必修“歷史”，“大一國文”也是必修的，那時還要修“大二國文”，也是必修，英文還可以修至“大三英文”，那是選修，這當然是錢穆院長的德政。

讀的時候可能是怨聲載道，但日後的影響深遠，到人長大才知道。既然讀歷史，不得不知上世紀歷史四大家。以出生年月來排，陳垣（1879-1971）、呂思勉（1884-1957）、陳寅恪（1890-1969）、錢穆（1895-1990）。四人中錢穆

最年輕，去世亦最遲，曾在香港創立新亞，其實前後才 18 年，在他 95 歲的人生中，只是五分之一而已，也只是筆者一輩，比較知之。錢穆 1949 年離開大陸，免了文革之苦，呂思勉則早逝，而二陳卻不可免，陳寅恪更是世家之後，是“公子的公子，教授的教授”，自然更苦，但陳垣得年 92，陳寅恪得年 79，也算高壽了。

陳垣在 1929 年當上輔仁大學校長，指定“大一國文”，文理科學生都必修，要求大學生能“很好掌握中國語文這一工具與人交流，充分、正確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科研成果”，並親自主持，選定有根底的中年教師講授。學生中出現啟功、牟潤孫等著名學者。錢穆 1949 年到香港成立新亞，亦復如此，更加上中國通史。陳垣開課有“中國史學名著評論”，今天看來太高深，要研究生才可唸，但錢穆的“中國通史”和呂思勉的“中國大歷史”，內容涉及民國初年，學生才得知中國之弱。

中國文化本源所在

新亞師弟說被年輕人問“何以喜歡中國文化？”一時語塞，其實這是錢穆新亞精神一個主要支柱，錢穆在 1986 年一篇《今年最後的一課》的講稿結束語說：“你們不要忘了自己是一個中國人”，“這是一切大本大源之所在”。“要根據這本源來規定自己學問路向，來改良社會風氣”。但這位師弟說，在這位年輕人心目中，“中國人”和“香港人”都是空話。

1986 年，錢穆說話的對象亦是年輕人，更早一點，牟宗三亦提出五四青年特質，多自西方歸來，只知羨慕西方，回來祖國，只是寄居，正是這種寄居心態，加上受自由主義影響，只知自己的個人自由和學術自由，追求社會地位，將“國家民族、歷史文化”視為空論。

在香港這個華洋雜處的環境，新自由主義橫行的境地，青年人不知有祖國，也就沒有甚麼稀奇了，牟宗三的解藥是“有一積極的正面精神上之崇高

理想”。看來有點難，其實遠自一百年前創刊的《青年》雜誌（如今猶在），創刊號就希望當代青年能“自覺和奮鬥”。

錢穆一生講學，是勸年青人要當一個“通人”，莫為一專家，西洋文學家就是文學家，史學家就是史學家，政治家就是政治家，此為“專家之學”。西洋人沒有中國人之所謂“士”，所謂“通儒”，沒有一個中國史學家可以不通經世文學，也沒有一個中國史學家、文學家，當不起中國文化大統之首的“士”的身份，此乃中國文化的吸引之處，惟有知道自己的本源，一切才能發展，不信照照鏡。

錢穆墨寶展感言

2016年12月6日，新亞校史館舉行錢穆墨寶展的開幕儀式，筆者剛要返回上海，無法參加這盛會，不過卻在12月2日下午，有了一個獨賞的機會，不是特意安排，只因展館內空無一人。

對筆者而言，此展不在錢穆大師的書法有多好，剛賞過王羲之、李世民的碑，又看完北魏碑帖，還未消化完呢！此展在乎錢穆對後輩的點撥，在字裏行間看真功夫，正如錢穆給葉龍的信，提到韓愈文章說：“學文即學道，此乃唯一之正道也。”“毋一語非教做人乎，毋一語非超世絕倫者而能道之乎。”1960年5月給余英時之信，則說：“勿心慌，以安閒沉着的心情讀之”，不得浮躁也。五十多年過去了，亦有用。錢穆作品中，《近三百年學術史》和《學籥》，“入學門徑與讀書之法，盡在兩書之中”，《學籥》1958年版，“好學之士，取而為法，亦為學之門之一途。”我們這些後學有多少人被告之要讀《學籥》呢？

筆者晚了五十年，錢穆大弟子應為嚴耕望，因為錢穆還未到香港，曾在武漢大學教書，而嚴耕望乃當時的學生，1962年，錢穆給嚴耕望的信，回顧1937至1962年間：“二十五年盡在亂離窘迫中過去，豈能無慨於中！”新亞

書院 1963 年加入中文大學，錢穆 1966 年就離開了，筆者恰在這年秋天入學，才有機會聽過錢穆的無錫普通話，卻無葉龍一輩有上課的機會，這就是緣。不過，2014 年是新亞六十五周年慶，筆者有機會出版《讀史觀世》，以紀念錢穆，也是緣中之緣了。

天人合一論天下

二十世紀西方世界製造了三大神話：一是自由市場能提高全世界的生活水平；二是民主制度保證稱職的政府有管理的能力；三是美國獨力可以維持世界安定。到了 1990 年蘇聯解體，神話好像兌現了，但僅僅維持 10 年。

到二十一世紀，9·11 慘劇證明美國在自己國土也可以不安全，遑論外國。巴黎慘劇非美國所能救，美國國內政黨互鬥，國會支持率已低到 9%，但九成在位議員可以連任；日本安倍經濟學三箭無效，一樣可續任三年，只要能計算就好；台灣小馬哥支持率也是 9%，但換行政院長就好，不然放了阿扁也可得分。自由市場只要有利盡量拿，那 6 萬家跨國公司，食安有問題只要派個當地管理層出來鞠躬就好，1% 變得愈來愈富，10% 只是為 1% 服務。

“華盛頓共識”早已變了“華爾街共識”，貪婪不但好，而且合法，一切合法就好，不合法可以修法，修到好為止，天道何存？西方有宗教而無天命，天命和人生要合而為一是東方的道理。1990 年，錢穆論“天人合一”，說“近百年來，世界人類文化所宗，可說全在歐洲”，但歐洲文化在二戰後已衰落，西方文化由美國取代，但美國文化只有二百多年，且亦來自歐洲，到二十一世紀，文化智力已竭。錢穆說以文化興衰而言，“西方文化一衰則不易再興”，而中國文化則屢仆屢起，數千年而不斷，因為能“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錢穆一生最後一篇文章以“天下”作結，意曰：“世界人類文化融合為一，各民族和平並存”，豈非二十一世紀所急需？

錢穆的“一個中國人”

錢穆勸學生們“不要忘了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不知多少次，最後一次見諸文字是1988年6月28日的台灣《聯合報》，是錢穆最後一課的講稿，是結論中的兩點之一。

第一點，“你們不要忘了自己是一個中國人”，這是一切大本大源之所在。第二點，要根據這本原來規定自己學問路向，來改良社會風氣。這篇文章名為《今年我的最後一課》，有心人宜拿出來再讀一次，講課時恰為端午節前夕，所以舉了屈原來當例子，端午節用意是在紀念屈原其人，不是為了吃粽子，也不是為了龍舟競賽。

錢穆認為，“龍舟競賽，則早已西洋化。文化侵略，可畏如此。”錢穆提到《史記》中，司馬遷將屈原和賈誼合傳，而不是弟子宋玉，是太史公的偉大，這篇列傳短短六頁，誰都有空拿來看看。

屈原流放，是“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傳中錄了《懷沙賦》，其中兩句“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不難理解。屈原死後，其弟子宋玉、唐勒、景差，人人寫賦一流，但“莫敢直諫”，中國人後來以端午節紀念屈原，千古只有一人，沒有誰有此殊榮。太史公說：“賈誼弔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確實七國皆想聘屈原，連秦王亦如此。又說：“讀《鵬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寫得真好，時至今日，屈原、太史公已少為人知。

錢穆亦自云，過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遺忘了。當時梁啟超、胡適之已少人提及了，誰再提“中國人”呢？

錢穆南懷瑾均選太湖

1990年9月，筆者由洛杉磯調到台北工作，第一件從報上看到的消息就是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去世的消息，這一年亦是由台北市議員陳水扁發動，

將錢穆趕出東吳大學內的素書樓。

當年請錢穆、林語堂等大師回台搞“新文化復興”，對已經執政的李登輝毫無意義，亦無人仗義執言，台灣的“去中國化”其實已在無聲中開始了。林語堂葬在陽明山家中，變成故居紀念館，墓木已拱，還不至於遷墓，算是大幸。錢穆在 1992 年歸葬太湖西山，報上是隻字不提，筆者是從新亞舊友得到消息。

另一位大師南懷瑾，在台北教朱熹學說和《易經》，學生是副部長及有升遷機會的高官，原因據稱是改變頭腦，去換蔣介石注重的“曾胡兵法”，曾國藩和胡林翼理論自此退出台北官場，南懷瑾亦在無聲中離開台灣，經香港再到大陸，選址亦在太湖旁，不過錢穆的西山俞家渡，屬蘇州，而南懷瑾的“大學堂”卻在無錫，太湖的對岸還有湖州，太湖真大啊。

2014 年 12 月，筆者和同屆老友攜同二位上世紀 90 年代畢業的師弟，同赴錢穆西山之墓致祭。太湖浩瀚，風景殊佳，二十多年後，墓前松樹已由小變大，還有一棵被風吹倒了，理宜再植。守墓人俞菊英女士住在山下，全程陪同，其情可感，湖邊已有豪宅古北稚園，風景大家共賞。祭後專程到 90 公里外的大學堂，不知南懷瑾墓是否在此，不得其門而入，但這家教小學生的大學堂，規模可觀，他日安排好再往！

錢穆評曹丕

返港收到《錢穆講中國文學史》(商務出版)，當然立刻拜讀，這是錢穆遠在 1955 年講學的筆錄，葉龍先生至今才公諸同好，好像有點遲到。

錢穆 60 年前曾感歎，五四白話文運動後 30 年，當日青年已無國文根基，連胡適的調皮活潑的文章，時人已不易懂了，何況梁啟超“洋洋灑灑，寬大而散漫”的作文呢？孰知 60 年後，白話文也不成了，已是網絡文字，下筆千言，已算太長。錢穆希望“今日青年應能看 2000 年前的國文，又應能看 50 年

前的英文書，才合水準”。那已是在“學術界作自由人”了，但花三五年時間讀通中英文，今日在商界，也是最低標準吧！

錢穆書中看重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領頭的建安文學，是“落花水面皆文章，拈來皆是文學境界”，其中曹丕的書信寫的是親切有味的日常生活瑣事，這種親切而有味的文學，是兩漢所無，曹操之後才有。西方人寫人生是寫別人的，中國人則是將自己投入進去，錢穆希望有人“創出一種東西調和的文體”，曹丕有學者頭腦，亦尊重學術，可惜由於政治上不為人所看重，所以很多文章亦失傳了。

錢穆認為，曹丕是在中國文學史上講文學之價值與技巧的第一人，主張“文以氣為主”，但“行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所以家長再好，也救不了子弟的。“文人相輕”這句話也是曹丕寫的，主因是“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曹丕、曹植只能是各有千秋，後世貶丕捧植，只因一為帝一為王而已！

通人和達人的要素

錢穆除了勸學生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外，同時亦常勸學生本為一“通人”，莫為一專家，不要為慕效西方文學，而專為白話文，忘記了還有“古典文學”的存在。錢穆一輩讀歷史，也讀《楚辭·離騷》，也讀《史記·屈原賈誼列傳》。

在錢穆講學的年代，這些文章已歸入古典文學，少人誦讀，讀歷史而不通文學，不知屈原、賈誼其人和他們的作品，當然不是“通人”。錢穆認為，沒有一個中國史學家可以不通經學文學。西方可以，西方文學家就是文學家，史學家就是史學家，政治家就是政治家，經濟學家就是經濟學家，沒有“通人”，所以西方發展到治國一團糟，恐怕也在此。

日本則有“匠人”、“通人”、“達人”的觀念，今日人們好從日本抄來“達

人”一辭，不知道“達人”只是日本學徒制的產品，師傅是“通人”，徒弟畢業是“達人”，達陣的人，剛剛畢業而已。日本匠人秋山利輝寫了本《匠人精神》的書，他的人才培養制度長達 8 年。“1 年預科、4 年學徒、3 年帶學徒”，8 年後才能自立。4 年大學制實在太短，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也有道理。秋山要培養一流匠人，或一流人才，有 30 條法則，如成為“有責任心的人”、“能為他人着想的人”、“不會讓周圍的人變焦躁的人”、“成為很會打掃整理的人”、“成為能夠擁有自豪的人”、“成為勤寫書信的人”等。其他要素如“禮儀、感謝、尊敬、關懷、謙虛”，秋山理論是沒有超一流的人品，單有技術，是打不動人心的，壯哉斯言。還好，秋山理論未被日本廣為接受，“匠人不易，通人更難”。

齊名文化和萬物共容

錢穆在論文化之際說：“一國的文化是民族性的表現，為表現民族文化的偉大，可以讓萬物共容，不必定於一尊才是表示文化偉大”。所以中國歷史上，常有二人齊名，以唐朝為例，文化達到頂點有李杜的詩，李白、杜甫誰是略勝，看個人喜好；韓愈的文章雖好，但柳宗元的《永州八記》，韓愈也是寫不出；顏真卿的書法較為後世尊崇，但柳公權的字亦不遜色；吳道子的畫已無真跡，好在傳說中，但李龍眠的畫亦復如是，今人看不見。原來最難傳於後世是畫，太多用來陪葬了，能不能傳也是看時代氣運。

西方文化有沒有齊名的現象，筆者沒有研究，但西方既重“贏者全取”，奧運只有金牌得主才有市場價值，齊名恐怕也很難。美國過去 30 年，最流行的理論是“新保守學派”，其代表人物 Wolfowitz 主張美國要通過武力在全球保持領導地位，同時要遏制任何強國的崛起。73 歲的他目前仍是小布殊老弟的選舉顧問，新保守派會不會回朝，也是 2016 年的一個懸念。

中國希望“變對抗為合作，化干戈為玉帛”，這是良好的東方文化願望，

但和新保守派理論背道而馳。美國文化要選擇那條路，基辛格在他那本《美國全球戰略》書的結論說，美國“問題不在於缺乏有獨到見解的領導人，而在於領導人普遍缺乏文化修養”，對美國文化固然一知半解，對中國文化更一無所知，哪裏能體會出中國文化中的“齊名現象”和“萬物共容”的追求？中美兩國齊名就好，誰是老大，誰是老二，亦見仁見智，何必爭！

互相剪滅的英雄輩

少時讀淝水之戰，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總以為東晉謝玄是好運才得勝，苻堅是運氣不好。其實不然，淝水之戰六年前，謝玄鎮廣陵，創立一支北府兵，精銳無匹，領軍是劉牢之，軍中好手劉裕，就是南朝劉宋的開國之君；謝安謝玄叔姪，又怎料得到呢？

東晉諸帝都是無權的虛君，大權在國相之手，可以亡晉的基本上有桓溫、桓玄和劉裕。桓溫自身帶書生名士氣，心有君臣名教，所以篡逆終不成。桓玄廢晉安帝自立，為劉裕起兵所破，敗死。晉安帝復位，劉裕入居中央，掌握政權。但劉裕是粗人，“不為名士所歸”，沒有名士，就欠了輿論，也沒有了支持，所以劉裕北伐之時，“在廷之臣，無有為劉裕腹心者”。因此，劉裕雖然滅了後秦，卻一直有後顧之憂。當時，北方在前秦亡後，四分五裂，並無強大敵手，所以劉裕若能從容佔據長安來經營北方，滅了夏，則在南北朝分立之初，海內有統一之望，歷史改寫，中國免了170年的分裂。呂思勉論曰：“舊時的英雄，大抵未嘗學問，個人權勢意氣之爭，重於為國為民之念，以致同時並起，資望相等的人物，往往不能相容，而要互相剪滅這個實在使人才受到一個很大的損失。”劉裕亦如此，滅了後秦，同起義的同僚，都被剪盡，可信在朝廷之人，卻突然死了，不得不退兵，結果長安為夏的赫連勃勃所佔，“內部的矛盾，影響到對外”是深刻極了。到當下，企業挑選接班人亦莫非如此。人才去盡，只餘一人，業績又怎能不受影響，當事人愈強為害

愈大。

學貴族讀《左傳》

話說土豪們要玩 upgrade，追求“低調的奢華”和“貴族文化”，卻不得其法，筆者建議由《左傳》入手。春秋時代，是中國古代貴族文化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致的時代。”當時的貴族，“對人生有一個清晰和健康的看法”，不會一天到晚想移民、移錢、移子女於異邦，惶惶不可終日。

所以不想當土豪，首先由“人生的看法”裏入手，而不是想入“富豪榜”。春秋貴族們，見識淵博，人格完備，嘉言懿行，幾乎幾個稍有名的國度裏，都有極可敬仰的人物，隨便一些官員如鄭子產、西門豹、晏嬰、晉叔向；遊士如魯仲連；不必說孔子了，甚至在戰爭中、外交上，貴族們都能“文雅風流”。

戰爭中，不失“重人道，講禮貌，守信讓”，當時往往有賦一首詩，寫一封信，而解決了政治上之絕大糾紛，辭令之妙，更為後世稱羨，哪有如二十一世紀的“G8 變 G7”，變得如此硬碰硬，這是貴族文化上的修養和了解。

春秋時代的國際間，雖不斷的兵戎相見，但大體上仍是“重和平，守信義”，哪有如現代的“背信棄義”，推翻前說如翻書。春秋時代的國際間的和平團結，持續有二百年之久，而當時的國際公法，亦極為高明可貴。一部《左傳》記載了列國的國君和卿大夫私生活，和他們相互間的交涉，不論內政外交均在其中，當然貴族最後沒落，而貴族的問題在於“不恤民情”，役使民力逾量，最好的例子是秦始皇，建長城、阿房宮，而貴族由平民取代，是歷史的必然。

改進中善處反動

北魏孝文帝全面漢化，遷都洛陽，時年二十九歲，可惜短命，五年後就

死，得年三十四歲；若是長命，統一南北當在北魏。但孝文帝死後，鮮卑貴族並不能繼續改進，並急速腐化，乃致亡國。錢穆結論是：“凡歷史上有一番改進，往往有一度反動，不能因反動而歸咎於改進本身，然亦須在改進中能善處反動方妙。”孝文帝的改進是對的，後來反動而亡國，怪不得孝文帝，不改進可能更早滅亡。“改進中善處反動”是後世必要醒覺的。到北宋宋神宗王安石的變法，當然也是改進，改進的必備條件是宋神宗“充分授權”，古代稱為“非常相權”。王安石是“得君行道”，君是奮發有為之君，臣是生氣勃勃之臣，但敵不過傳統勢力，而傳統勢力本身又全無新計，這是北宋不得不亡之故。

這段時間，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全部上台演出，但文章寫得好，不表示管理就好，這是後人最大的誤會。唐代之衰，亦是“詩賦日工，吏治日壞”，李白杜甫亦非管理良才也，後人責難王安石開權相之惡例，所以其後有宋徽宗時的蔡京、宋高宗時的秦檜、宋寧宗時的韓侂胄、宋理宗時的史彌遠和賈似道，都是權臣專政。秦檜和賈似道更列入奸相行列，秦檜獨相十五年，其間輪流用了二十八名執政，皆世無一譽，誰又記得起呢？秦檜主和，亦可算“一以貫之”，當時沒有漢奸一詞（漢奸始於雍正朝），但中國人自秦檜之後，竟認為對外言和為正義公論所不容，明亡亦由此，秦檜之罪可延至二十一世紀！

培養情趣 提高境界

錢穆在《讀書與做人》一文中指導後學的八字真言是“培養情趣，提高境界”，讀書要讀哪種書呢？那要“由千百萬人中選出，經得起時間考驗，而能保留至今”的書才有用。看“暢銷書榜”不如無榜，最少也要經幾十年仍流傳的作者，才能達到“人生境界高，情味深”，才可以做榜樣。

這一點另一位歷史學家呂思勉亦有相近的看法，他說：“近人所著的書，

非不條理分明，語言朗暢，而且都站在現在的立場上說話，絕無背時之病。”所以每個作者都有其“懸疑的讀者群”，大都是普通人，標準較低。於是乎極精深的見解，在不知不覺之間，便被捨棄。終身讀這些書，便無機會和最大思想家的最高思想接觸。所以有些古人著的書，只求藏之名山，並不多求普通人的了解，故以“內容雖極駁雜，而精神處自不可掩”。

錢穆和呂思勉一代，仍可看中國古文並無問題，到了二十一世紀，他們的文字亦變古了，他們一代如梁漱溟、錢鍾書、林語堂、楊絳，寫的是較早期的白話文，仍是十分精練。如錢鍾書談人生，要有“精神煉金術”，“使肉體痛苦都變成快樂的資料”，把“忍受變為享受”；林語堂的“人生不完美是常態”；楊絳的“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和從容”。梁漱溟談人生的修練最高境界如鬥雞的呆頭呆腦，不動聲色，身懷絕技“秘不示人”，入鬥場才會“所向披靡”。

近人談讀書，有高希均所說：“人生終點，不是死亡，而是與書絕緣的那一刻。”醒世歌中言：“頃刻一聲鑼鼓歇，不知何處是家鄉。”還是讀書好！

理想與人才

錢穆分析西晉統一後 12 年即亂，52 年即亡，只因兩點：一是沒有光明的理想為指導；二是貴族家庭之腐化，無良好教育，至多三四傳，子孫即愚昧庸弱。但光有光明高遠的理想，是否就能成功呢？

不是。到北宋就有王安石新政的例子，王安石新政的理想有三：一、“保甲法”為本，“兵農合一，武裝自衛”的社會；二、方田、青苗、均輸、市易法是為造成“裁抑兼併，上下俱足”的社會；三、興學校、改科舉則是求“開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會。王安石的新法之後，還有“新學”，即其註“詩書禮”三經，謂之“三經新義”，是後來南宋朱熹的《四書集註》的正版，筆者等在五十年前還是要苦讀的。王安石要讀書人“不憑註疏，不局法令”，可

以自由發揮，而達到“人才自出，治道自舉”。但王安石的新法不敵反對派，否則科舉制在北宋已廢，又怎會流毒五百年，造成中國十九世紀之弱。

王安石新政，亦代表中國南北經濟文化轉動的應有現象，王安石代表南方的開新與激進，司馬光舊派則代表北方的傳統與穩健；而王安石新法恰似對南方人特別有利，而對北方人特別有害。北方人中又分了三派，程顥的洛派、司馬光弟子群的朔派和蘇東坡的蜀派。程顥本來支持王安石，終因王安石“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來執行新法。到王安石雖走，但用的人仍在，如蔡京仍為司馬光重用，程顥感歎“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所以高遠理想如無執行之人，一樣敗亡，歷史之鑒也！

中國文學最高境界

錢穆在《中國文學史》中談到：“今日青年應能看兩千年前的國文，又應能看五十年前的英文書，才合水準。”可見六十年前的新亞書院已是中文英文並重，那兩千年前的國文是哪些呢？

錢穆是極端勤力讀書的人，今日已很難學到了，只能依賴錢穆指導的一流書籍。錢穆在書中說“屈原、杜甫可說已達到中國文學最高境界，而陶淵明則較次。”所以《楚辭》是重要的，最少要知道《楚辭》中的“兮”字是楚音，是“啊”的意思。項羽是楚人，所以“力拔山兮氣蓋世”，劉邦亦是楚人，所以“大風起兮雲飛揚”，韓信也是楚人，卻沒有留下甚麼。楚國在漢水流域，所以楚漢之爭，亦不過是南方人自中原取得天下，讀文學才知歷史。

錢穆又說，中國文學家中兩大人物，“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學與道德的問題”，“一位是司馬遷，他解答了文學與歷史能否合流的問題”。司馬遷的《史記》，是一部極嚴格的史學，且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司馬遷是具備“史才、史學、史識、史德”四者於一身的史學家；又是文學家，“寫人物分

析得極為詳盡，批判卻極之簡明”，這是兩千年來寫文章的秘笈，筆者知之久矣，學而不足。

錢穆專門研究“天人合一”，論文學亦講“文學與人生合一，杜甫的詩不超脫，李白超脫得多了，但杜詩都是人生實用的，境界尚高於莊子（莊子只是哲學家）”，“今日人們陷落於物質生活中，已不出人才了”，這是書中原話。司馬遷《報任安書》提到，好文章大概是“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才會產生，今人太舒服了。

家教與門風

北京兩位教授不約而同在電視上談起“家教與門風”，人格的培養，靠家風而不能靠學校，歷史上本就如此。但自從流行小家庭，一家只得三四口，古來家風，早已在百年前被一聲“封建禮教”所封殺，落得今日如此。“港女大鬧台灣”，也不過是冰山一角。

“家教與門風”來自東漢末年，盛於魏晉南北朝，門第精神是魏晉南北朝的立國支柱，維持了四百年。門第主人就是名士，雖不通世務，卻善得家門。名士清談，放情肆志，但內部自有家教門風，子弟不得不守。其來源是東漢“名教禮法”的傳統，但任何門風都有衰敗之日，清末被罵的“封建禮教”就是變種，原因亦是“富二代”、“貴二代”的出現。

以南朝為例，南朝的王室，在富貴家庭長養起來，“但並非門第，無文化的承襲”（錢穆語），這些人只染到名士的“放情肆志”，卻沒有名士的“家教與門風”，變成“放情胡鬧”。王徽之的行為是雪夜訪友，興奮而返，沒見戴安道；齊朝東昏侯行之，則是“通宵捕鼠”，王徽之有“排門看竹”的雅事，看好竹盡而去。宋後廢帝，無知識，無修養，則到新安寺偷狗烹食，喝醉回宮遇弒，死得不明不白。論家教門風的始祖，據說是顏回的後代、南北朝的顏之推所寫的《顏氏家訓》，寫盡當時的醜事為訓，但無論如何，能令子弟“明

辨是非”，已是功德無量。

錢穆在 1971 年的演講中，已感歎“家庭不教子弟，送給學校；學校也不教學生，一任其自由；故只能讓學生學而不能與的一種教”，乃人類之大患，於今猶烈。

再論家教與門風

據說北京一家幼兒園的負責人感歎，辛勞工作的結果是“五加二等於零”，苦心教導幼兒們五天，才教得一些紀律，但一旦回家二天，週末回來，紀律全無，可見在家的放任，要受訓的是父母們，不要怪老師了！怪教育負責人，更是太遙遠了。歷史的借鑒，怕是效法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門第的“家教與門風”，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門第，“能保泰持盈達數百年之久”。

“能使閭門雍睦、子弟循謹，維持此門戶於不衰。”（《國史大綱》）“當時極重家教門風，孝悌婦德，皆從西漢儒學傳來”，所以這些門第非但詩文藝術，經史著述，都有可觀，即使“品高德潔，堪稱中國史上第一、第二流人物，亦復多有”（錢穆語），所以門第之在當時，無論在南朝還是北朝，有如“亂流中島嶼散列，黑夜中燈炬閃耀”，在北方能同化五胡，在南方能“宏擴斯文”，功不可沒，而不能謂之變相封建勢力，或者莊老虛無清談。這一段歷史，講究“家教門風”的人要好好研究，但在歷史上非但門第，既使廣大而散漫的農村，亦有其家教，最簡潔是“舉頭三尺有神明”，農民的血液中有追求“天理”的因子，不能“傷天害理”是最簡潔的家風，“天地君親師”是必備的神位，加上滿天神佛，由關公到媽祖的崇拜，敬天畏地是自然的。拿現代都市的紅燈亮起，過不過馬路的規則來衡量農村來的人，是格格不入的，中國人西化已百年，家庭亦發展到核心小家庭，家教與門風亦早已失傳，“禮失求諸野，智亡在民間”，“五加二等於零”不能再成為新常態，父母醒來吧！

晚清民初歷史教訓

錢穆論晚清的歷史進程，認為康有為乃一局外之人，發動整個政局之改革，宗旨是“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但“連變，全變”，惟有革命，所以康有為此舉不啻為一種在野對於在朝的革命，所以，“戊戌政變”乃成為“辛亥革命之前驅”，前後亦不過 13 年。到辛亥革命，滿洲王室退位，但狹義部落政權的解體，其“長養遺留下的種種惡勢力，卻因舊政權的解體而潰決，有待逐步收拾和逐步清滌”。所以辛亥革命只是中國民眾一種新的艱苦工作的開始而非完成。

錢穆的觀察：“舊政權解體後緊接的現象，便是舊、黑暗腐敗勢力的轉見抬頭，而新力量無法加以統制”，這種觀察百年後仍有效。當時袁世凱鴻運當頭，乃做皇帝而終致失敗，否則他當其總統而無人可以推他下台，雖然他會不會早死誰也不知（那是家族遺傳），而康有為亦誤認此狀態之意義，參加宣統復辟，晚節不保，否則不失為一大文學家和書法家。所以民初的政局，在這兩次動盪中更惶惑，而舊勢力更猖獗，孫中山亦無符。

這種黑暗舊勢力是甚麼，錢穆指出是各省軍閥割據，遠因是元明以來的行省制度的流弊。當時全國各地軍隊有 200 萬人以上，超過清末三倍，兵變內亂成為常態，而軍閥私生活不堪言狀，一人納姬妾四五十人之多，一切問題皆於鴉片煙、麻雀牌之間進行，“全國無所謂中央政治，無所謂軌道，用人無所謂標準”，黑暗過殘唐五代，真使得人驚！

引典故而知現代士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認為治中國史所必須注意的是：“中國史之演進，乃由士之一階層為之主持與領導”，而在中國歷史各階段中，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動內容與其對外態勢各不同，中國歷史演進，亦隨之有種種不同。

士如何定義呢？書中提出“知識分子”、“士大夫”、“讀書人”、“隱士”

(無意做官的讀書人)、“遊士”、“門第子弟”、“農村儒學家”，但自宋以後的士，“皆由科舉發跡，進而出仕，退而為師，其本身都係一白衣，一秀才。”直到清末廢科舉，興學校，教育普及，人人皆讀書，但不是人人可為官。現代的士，又如何定義呢？士是否再是主持和領導社會的人呢？

錢穆對宋代士大夫最推崇的是范仲淹，名言是：“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代表是北宋開國八十年後，慶曆期間的“時代精神”，“早已隱藏在同時人的心中，而范仲淹正式呼喚出來”，這亦是范仲淹的偉大處，錢穆指出范的同代人戚同文即是。

宋朝變法，乃由王室主動，宋仁宗和宋神宗即是例子，范仲淹的十事疏的前四項是澄清吏治：“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興學校，黜詞賦，擇官長。”，目標是“讓賢能者上升，不肖者下退”。但宋朝開國百年，種種優容士大夫，造成了讀書人的特有權利。范仲淹從頭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萬的官僚乃至秀才們，沒有多少能“以天下為己任”，亦沒有幾個能“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群起反對，“仕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本是管理之好事，但范只能倉皇而去，亦是有命無運。